

刘胡兰式的抗日女英雄

在汝州，曾出现过刘胡兰式的抗日女英雄，她的名字叫马英。

马英，汝州市米庙镇马村人，1919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岁当童养媳，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欺凌和压迫。1944年初，日寇侵占临汝，马英目睹了日本鬼子烧杀奸淫，搜刮民膏，无恶不作的残像，使她萌生了抗日杀敌的思想。恰在当年9月，共产党领导的豫西抗日先遣队，在皮定均司令员和徐子荣政委的带领下进入大峪店地区，发动群众组建民兵武装和抗日队伍，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马英此时带领全家积极参加抗日队伍，投身抗日斗争。她不仅动员支持丈夫当了村长和村民兵队长，还动员丈夫的哥哥何进和侄儿都参加

抗日队伍，马英本人主动担任了抗日先遣队的联络员，积极为抗日政府传递情报，筹集军粮，组织妇女做军鞋，她家成了大峪抗日根据地南部的联络站。

1945年7月12日，日本侵略军与当地汉奸土匪黄万镛勾结，集结数百名土匪疯狂向抗日根据地进攻。守卫大峪根据地南部的20多位民兵，由何进率领，进行英勇抵抗，但因寡不敌众，何进带领民兵转移。马英为了保护民兵安全转移，自己回家取军粮单未来得及走被土匪抓去。土匪队长刘金堂带几位土匪对马英进行严刑审讯，追问：“八路军去哪里了？”马英怒视刘金堂说：“不知道！”一直逼问了大半天，马英总是一句话，不知道！敌人看审问不出什

么名堂，就把马英带到土匪队长刘金堂的老巢麻城寨。在那里，敌人把何进捆在院里，打得死去活来，还抄起一把大刀向何进砍去，何进大叫一声，昏死过去。敌人想以此来威胁马英，马英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在敌人威胁时再一次坚定地回答说：“八路军在哪里，我不知道！”此时，敌人对马英使出了更加残酷的手段，把马英衣服脱光，用烧红的铁链往马英身上烙。马英身上被烙得吱吱响，鲜血和油冒着烟往下淌，马英当即昏了过去。敌人用冷水把她浇醒，继续拷打。马英宁死不屈，仍然坚定回答：“还是不知道！”一群疯狗似的敌人，在什么也没得到的情况下，一拥而上，用刺刀向马英身上乱刺。就这样，马英为抗日献出了年仅26岁

的生命，人们称她为刘胡兰式的抗日女英雄。

资料来源：《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供稿：陈凝



扫描二维码收听马英的革命故事

抗日先锋郭狮子

1928年，郭狮子生于汝州市大峪镇大碗沟自然村。抗日战争时期，他刚刚16岁，就积极参加了抗日反霸斗争，多次为八路军河南军区司令部及临汝县抗日县政府转送秘密信件，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由于聪明机智，担任了八路军干部张清杰的警卫员。郭狮子多次深入敌巢，宣传我党的统战政策，机智灵活地保护了首长的安全，被誉为大峪根据地的“红色通信员”和“小党员，红狮子”。他的传奇事迹，至今还在大峪老区人民中间传颂着。

1944年8月底，皮定均、徐子荣领导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受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重托，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解放了大峪地区，开辟以大峪店为中心的临汝抗日根据地，成立临汝县抗日政府和临汝县抗日区政府。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和“倒地”运动，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出身贫寒的郭狮子，刚刚16岁就和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到抗日的革命潮流中。他参加了民兵组织，与日伪和土顽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

当时主抓统战工作的中共临汝县委副书记、皮徐支队情报处长张清杰同志，发现



郭狮子年龄虽小，却聪明、勇敢、机灵，就挑选郭狮子当自己的通信员和警卫员。从此，郭狮子跟随张清杰同志转战于临汝、登封、偃师、巩县、密县一带，护卫领导与各界人士进行谈判，传递秘密情报。他经常到大峪周围或外县为八路军首长特别是张清杰传递机密信件。有时，他还要单独把首长写的信件送往巩县、偃师等地。

为了麻痹敌人，保证按时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郭狮子有时把信藏于布袜中，拄着拐杖装疯，戴着女人头饰装妇女，有时提着篮子边走边讨饭。他经常起五更摸黄昏，忍饥受饿，流汗受冻。有时深夜无法问路，就钻麦草垛，睡古庙。有一次，他接受任务，要单独到百里外的偃师给部队首长送信，路过十八盘，听到狼群乱叫。他猫着腰，生怕出事。最后半夜赶到部队，通过口令对接，顺利见到首长，完成了任务。郭狮子返回时，突降大雨，雨水顺衣服往下流，路滑难行。他硬着头皮冒雨赶回来。他把首长复信装进小竹竿顶端的竹筒内，连挂带护，按时把复信完好交给张清杰，张清杰十分感动。张见党峰时夸奖“小狮子”是独胆英雄，说他小小年纪，两天雨中往返二百多里，真了不起。张清杰还特别介绍郭狮子提前入党。后来张清杰从大峪到焦村，要会见地主武装头子焦道生，劝说焦不要春与大峪八路军为敌。回来后，张清杰经常对同事和民兵干部说，我在豫西搞统战工作比较顺利，团结了许多民主人士，这里面有郭狮子这

个小青年的一份功劳。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及河南军区为啥要把司令部迁驻大峪老区这一重大事件。

1945年初，党中央组建以王树声为首的河南军区司令部。决定以嵩山地区为中心，开展抗日活动。但是到了嵩岳地区，山高路陡，不便迂回战斗。河南军区只好临时驻扎在距班庄村约十八华里的登封孙桥村。正在王司令员为寻找合适驻地作难时，张清杰带领大峪抗日县政府的民兵郭狮子和裴富申等十几名八路军和巡逻民兵赶到孙桥。张清杰向王树声、戴季英等军区长汇报了大峪抗战地形优越，转战方便，地方民兵武装组织坚强，群众拥护八路军基础很好。同时还列举了随行的郭狮子等一批英雄民兵事迹。王树声等首长当即拍板“搬！去大鸿寨西，驻大峪！”命令下达之后，张清杰一队人马迅速返回，报告临汝县县长党峰，立即作好迎接军区司令部和司令部率领的几个支队驻大峪的先期安排。随后，王树声司令员率领陈先瑞、张才千、陈昌毅等支队，先后夜间跟着大峪的民兵向导，几千名八路军，先后分散驻扎在班庄、樊家庄、东窑、稻谷田、王沟、高崖头、竹园等大峪以北、以西二十几个自然村。王树声把皮徐支队编为第一支队，他带的几个支队和豫西阎学圣等支队依次共编六个支队。后来，张清杰把他建议河南军区迁驻大峪这段故事，还写进他的大峪抗战回忆录中。河南军区以大峪为中心，指挥河南抗

战，解放了豫西的大部分县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1945年10月4日，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郭狮子因父母有病需要照顾，张清杰和其他首长研究后只好忍痛割爱，让郭狮子留下照料老人。并交代郭狮子说，将来打蒋介石，一定回来看望他。新中国成立后，张清杰写信请郭到北京见面，想为郭找份合适的工作。可郭收信后一直没有来得及进京。1983年10月，时任国家石油工业部石油科技情报所所长的张清杰从北京远道而来，慰问大峪老区人民，并亲切接见了郭狮子，一起回顾那难忘的峥嵘岁月。后来在党和政府及张清杰同志的关怀下，政府每月为郭狮子发了生活补贴。1999年2月郭狮子因病去世。

资料来源：《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供稿：陈凝



扫描二维码收听郭狮子的革命故事

清醒的姚崇

● 魏郭



唐朝历史上，有一位特殊的宰相，不仅服务了三代皇帝，而他对于朝政和家风清醒的认识，甚至影响到了之后宋代的一位名臣范仲淹。三百年后，范仲淹来到他的墓地来拜谒，也迷上了这个具有丰厚人文积淀的地方，并在人生百年之后安息在他的附近，与他比邻而居，两位先生成就了万安山的巍峨。

今年的春天似乎比以往来得要晚一些。时令已是仲春，却鲜见明媚的春光，阴阴朝朝暮暮，天气阴冷而潮湿。等了几天，始终见不到阳光出现。一阵细雨过后，天空露出了一片鱼肚白。我的车子已经迫不及待赶到了万安山麓。

郁郁葱葱的翠柏标示出一条清晰的通往景区的道路。在第一位先生范仲淹墓地范园的东侧，衍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通向不远处一座红墙青瓦的仿古建筑。

麦苗青青，油菜花黄，梨树初绽，桃花烂漫，先生姚崇的墓园，不显山露水，仿佛居于坊间的一位隐士。

红墙青瓦，姚园虽被修葺一新，然而比起范仲淹的范园，要小了许多。姚园的大门紧闭，南侧的小广场上也看不到一辆车子和一个人。唯有大门上方金字的“姚园”，以及两旁白墙上书写的隶书“大唐贤相”“百世师表”，在彰显着墓主人的显赫地位。

我们一行从园子东侧虚掩的偏门进入，看守墓园的老人闻听我们是大老远从汝州

跑过来的，惊喜地把我们比作“稀客”了。

松柏青青的墓园，一座面阔五间的姚公祠，祠堂之后约二十米，就是先生穹顶的墓冢。

这个宁静的墓园，一如始终清醒的先生，处于人生顶峰而主动辞相，处于激流险滩而挥洒自如，贬官地方依旧勤政爱民，时时刻刻不忘告诫自己、告诫同僚、告诫子孙，廉洁奉公、勤俭持家。

唯其始终以清醒的头脑看待得失成败，方得始终。

神都洛阳，见证了先生的崭露头角、施展才华，见证了达到权力顶峰的先生，也见证了先生力挽狂澜的大智慧，也见证了先生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武则天授元年，先生从郑州司仓参军的位置上，被朝廷召回，在神都洛阳担任司刑寺的司刑丞一职。一代女皇武则天为保障自己顺利登上大周皇帝宝座并巩固之，大兴酷吏，残酷地镇压了有反抗言行的李唐宗室及元老大臣，同时也滥杀了大批无辜，朝中大臣人人自危。

先生就任司刑丞后，接受最多的案件就是所谓的“谋反案”。先生深知在酷吏当权、滥杀无辜的武周时代，即便言语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更何况还要主持审理一件件“谋反案”，这是一项火中取栗的高风险工作。

但先生却从实际出发，公正执法，被关押的“谋反案”中许多官员，经过先生的审理，都被无罪释放而保全了性命。三十多年后，先生去世，就连与他有过过节的大臣张说也在《姚崇神道碑》中赞扬说：“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执法无颇，全活者众。”

先生的临危不惧、秉公执法，让处心积虑打压李唐旧势力的女皇也钦佩不已。之后，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内兄归州刺史孙万荣起兵造反，连破营州、檀州、幽州，先生被提拔为复官（兵部）侍郎，参与平叛，逐渐进入女皇核心政治圈。

先生的政治勇气，令人惊叹。有一次，武则天召见群臣，让大家发表对昔日酷吏周兴、来俊臣处理“谋反案”的看法，群臣都噤若寒蝉，唯有先生冒着杀头危险，实事求是地指出了酷吏政治的危害性，建议女皇废除酷吏政治、推行仁政。这个建议最终被女皇采

纳，先生也第一次成为当朝宰相。

先生任相之后，成为武则天处理军国要务的得力助手。在整顿边防、讨伐突厥、处理盐池事务中，彰显出高超的政治手腕。

但处于权力顶峰的先生毫无骄纵、清醒的他虽然尽心辅佐武则天，但对女皇的作为并不完全赞同。先生屡次以侍奉老母等为由，向女皇提出辞呈，希望不再过问政事，意欲急流勇退。

神龙元年，张柬之、崔玄暉、桓彦范等拥太子李显起事，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率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攻克洛阳宫北门玄武门，直趋武则天所居长生殿，斩武则天宠臣张易之，张宗昌于殿庑之下，以武力逼劝女皇退位。

政变成功后，中宗恢复了大唐王朝。二月初五，中宗率百官到上阳宫向武则天请安。人走茶凉，曾经谈女皇色变的众官再次见到武则天，只是礼节性地施礼，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君臣大礼。只有率真的先生，看到苍老憔悴、多病的武则天后，竟然伤心得“呜咽流涕”，众官皆惊。先生因此被贬官地方。

景云元年，睿宗继位。姚崇被征召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升任中书令。姚崇与宋璟协力合作，革除中宗时期弊政，任用忠良，贬黜奸邪，赏罚分明，杜绝请托，使得各项法度重新得到整顿，朝野都认为国家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睿宗复位之后，太平公主干抗朝政，诸王手握兵权，对皇太子李隆基构成威胁。因与太平公主有隙，先生又被贬官地方。

开元元年，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成功即位。大才的先生再次被拜相，开创了“开元盛世”。

贵为三朝宰相，先生却崇尚节俭，以至于在京城长安没有自己的府邸，寄身于闾极寺中。他先后写了多篇教育子孙的家风文章，如《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遣令诫子孙文》等，教育子孙要以忠事国，以孝持家，清清白白，恪守本分。

在女皇则天大兴酷吏政治期间，处于风口浪尖，审理“谋反案”的先生为了告诫自己，也为了规诫时人要慎言，亲自写了一篇《口箴》作为座右铭。后来《口箴》被刻于石碑上，代代相传。

处于君权神授的封建时代，先生却是一位难得的唯物主义者，不信宗教，以民生为重。

开元四年，山东地区发生蝗灾。当时百姓只知设祭膜拜，却不敢捕杀蝗虫，任由蝗虫嚼食禾苗。先生引经据典，说服唐玄宗及各地官员，力推灭蝗，把蝗灾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减轻百姓的损失。

即便在去世前，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具有进步的唯物思想的临终遗言《遣令戒子孙文》，提倡薄葬。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二月，先生葬于伊川万安山南麓。先生走得坦然而又风风光光。

一生清醒的先生，为世人树立了一块丰碑。先生的文韬武略，先生的力挽狂澜，先生的处变不惊，先生的忠孝两全，先生的坚持原则，先生的急流勇退，都让后来者仰慕和践行。

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守正守元，不为不义的名利所惑，面对得失进退，能够头脑冷静，泰然处之。这是我倾慕先生的地方。

思时人，为一时的名利，身家性命全然不顾，如飞蛾扑火，倏然明亮，旋即化作一缕焦黄，不亦愚哉！

我们最大的教训在于，在读历史人物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得失进退，往往评头论足、一目了然，而当自己身处名利缠绕时，却为了一己之私而浑浑噩噩甚至自甘堕落，而不知进退，以至于最终身败名裂，此时方悔，焉不晚矣。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叹息，又怎能不令我们振聋发聩。

在这样的思绪中，在松柏的林荫深处，我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径，行走在仲春静寂的墓园。因为思慕先生，忽然觉得，那一株株松柏，那悄悄萌生的簇簇野草，以及静默枝头突然鸣叫的雀鸟，仿佛都受了先生的感召，幻化作先生的一位位故友，平静而又亲切地迎接着我的到访。

由此想到，先生穹顶墓冢上灿如繁星的迎春花，不正是先生不灭的魂魄吗？

·连载·



(上接第2813期)

作为正定县的当家人和代表，近平同志做到了“和以结邻”。改革开放初期，正定亟待冲破传统农业发展路子。如果说破旧是内在观念的突破，那立新则离不开倚重环境和借助外力了。借助当时尚无隶属关系的石家庄市的外力，是近水楼台。1984年，通过多方工作，石家庄市向正定

提供了94个协作项目，在新上项目中安排农村劳力2000多人。在河北省第一个县级“技术信息交流交易会”7天会期中，正定获得外地提供的专利项目和科技成果1500多项。正定顾问团的建立，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热线联系，与石家庄市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乃至北上霸州、南下江南先进地区的考察、取经及友好往来，都为正定实现大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采访组：正定有悠久的历史，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的文化和文物保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王志敏：正定是一座古城，历史是这座城市的脊梁，文化是这座城市的魂魄。近平同志到这座古城工作，让他的文化情怀和这座城市包容厚重的文化底蕴产生了交集。

来正定之前他就从各方面对正定有所了解。真的来了，正定历史的厚重、文化的灿烂、遗存的辉煌乃至风俗的淳朴，让他感触更强烈，让他从心里对这座城市、这块土地、这里的人民产生一种亲切的感情。正是有了这样一种情感，在对这座古城文物的保护上，他投入很大心血和精力。县里部署对全县文物进行了大普查，让古建、遗址家底有了一册明细账，并且立起了统一标志、区划出保护范围、纳入城市规划。保护古树，让古槐、古松、古柏都登记造册，享受了围栏以护的待遇。编写出版和传播《正定古今》，让正定古城更好走出去、传开来。任命能文能政的著名作家贾大山担任文化局长，让文化系统有了一个叫得响的领军人物，文化事业得以更上一层楼。总之，凡有涉古城、有涉文化的事情，都无一遗漏地列入正定发展的工作日程。其实何止于此，遇有疑难问题，他还要亲赴亲为。为解决天王殿、弥陀殿、戒坛文物修缮的资金短缺问题，他不知往省委、省政府跑了多少趟！

对于历史文化，若说他是根植于心，对于革命传统则可谓他是脉衍于情了。革命成功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在正定，这不易之情化作了传统教育的载体与课堂。在他提议下，第一个党组织诞生地、岸下惨案发生地、赵生明烈士牺牲地等革命遗址，都以县委、县政府名义立了碑碣，置了匾额，以培树不忘国耻、弘扬传统的正气，激励同仇敌忾、强我中华的精神。

1982年春，近平同志刚到正定，看到县委大院的两棵苍郁古槐，感慨由生，专门嘱托办公室同志核实树龄，予以围栏、树以标牌，述以文字，因而有了古槐春秋之文字，立于两槐之址。通过这件事，他的文化情怀、文物情结，可得一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正定的牵挂一直延续到今天。请你们谈一谈，他赴福建工作后直到现在，与正定还有什么联系？

王志敏：1985年5月，近平同志离开工作3年多时间的正定，赴任厦门。正定，是他离开中直机关下基层工作的第一站，在他一路走来的记录里，正定成为他真正从政的始发地、真正当领导干部的起点。其实，他的正定情怀绝非只是因为始发地和起点，更是因为这块土地和这里的父老乡亲，因为他以心血辛劳耕耘的那份感情，为正定的一草一木打下了相知相亲的乡情印记。

2013年7月11日，近平同志在河北视察工作期间重回正定。在看望30多年前县委班子一起工作的老同事时，他饱含深情地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在正定工作3年，离开正定28年，这个过程就成了我人生永久的一种联系，实际上我离开正定以后，跟正定一刻都没有脱离联系。这就回到一个宗旨上。我们干的是党和国家的事业，党和国家的宗旨是什么？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以人民为中心，这种联系就是天经地义的、顺其自然的……所以，跟你们在一起，我感到很亲切，很自如，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是连在一起的。”

(未完待续)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放飞的金碗

崆峒山一带世世代代传诵着金碗的故事。说金碗是从崆峒山的宝殿下飞出来的。

很久以前的一天，崆峒山下一个姓周的外员五世单传的儿子叫广，在崆峒山上看见一只金碗像鸟一样在飞翔，金光闪烁。周广想这莫非是听老人传说的金碗吧？于是脱掉衣服扑打金碗，金碗终于被他打落了。儿子把金碗抱回家里，外员高兴万分。可是自从金碗抱回家里，儿子却一病不起。外员到广成庙上香祈祷，儿子的病也不减轻。一天夜里老人做了一个梦，梦见广成仙对他说了：“乘人之危置地产，为富不仁者，得金碗是祸不是福，放飞金碗让更需要的人得到他。碗飞病除……”外员醒后回想自己前不久还趁邻人家旧房倒塌砸死人之际，低价买回自己5亩肥田的事，顿感不安。

天明，外员把金碗向空中抛去，金碗乘风飞翔而去，儿子也忽然从床上爬起，喊叫着饿了。外员大喜，第二天便把低价买回的肥田又退回了邻人。三天后儿子痊愈，三年后周员外家又喜得一子。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